



上海三联书店

视点

2

吴士余 主编

全球化话语

梁 展 编选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P E R S P E C T I V E

PERSPECTIVE

视点
吴士余 主编
2

全球化话语

梁 展 编选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话语/梁展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吴士余主编)

ISBN 7-5426-1646-3

I. 全... II. 梁... III. 国际经济关系 - 经济 - 体
化 - 研究 IV. 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333 号

全球化话语(视点丛刊)

编 者 / 梁 展

责任编辑 / 刘宏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责任制作 / 钱震华

责任校对 / 王有钧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刷 / 江苏常熟市第四印刷厂

版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9.75

印 数 / 1 - 3100

ISBN 7 - 5426 - 1646 - 3

C·22 定价 22.00 元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若说 21 世纪将是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是不为过分的。世界文化格局承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重建新的架构,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它的一个显著效应将是世界人文资源的共享,人类文化在比较、融会、批判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因此,对话、交流、创新也将是 21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题词。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文化的传统界阈将被冲破,学术文化的生态平衡将向现代形态倾斜和转变;学术思维的创造性和科学性,以及价值判断的认知理性与实践精神将更明显地

被凸现出来。

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一是对传统的、本土的文化遗产的反思与重构;二是对人类文明的世界性考量。这是因为,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衍生了诸多新的人文现象和思潮需要去考量、追踪和研究。学术文化的发展不应停留在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诠释与总结上,而是要求学者能就新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新的人文现象、人文思潮作出迅速与理性的反应;积极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变革,并作出科学的应答。因此,文化交流、对话,广采博纳,审慎辨析,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以丰富自我,使中国学术文化多一些现代意识的内涵,就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以人文学术出版为本位的上海三联书店理应为国内学术文化的创新和繁荣服务。这也是我们在推出《三联评论》之后,酝酿和策划《视点》丛刊的初衷。前者意为在国内学界中坚和新锐提供学术创新的园地,后者则是介绍国外学界新的人文思潮和学术信息,为国内学人提供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企望将《三联评论》及《视点》丛书作为上海三联学术著述出版的两翼,来反映中青年学者在文化交流、对话以及文化承传和创新方面的成果。

《视点》是不定期的丛刊,强调人文学术的主题性,即每辑确定一个专题,约请专家编选国外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著述(或辑录其主要学术观点),并作综合性的评述,为求在某一学术专题方面能给读者有一个较完整的介绍。除了评介新的学术理念和信息,还将对不同文化价值判断的学术考量作理性的选择;为满足青年学子对国外学术文化的了解,还将对一些新的学术术语(包括跨语际的释义)作浅近的诠释。这些都将为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多层次与多元化需求提供服务,为国内学界的人文研究拓宽些学术文化的思

MBAB4 / 14

维空间。我们希望能跟踪当代国外学界的人文思潮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反映国外学者在这一课题上较高水准的成果。限于我们学识的肤浅,常常会留下种种遗憾。但对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去作不懈的努力和追求的。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是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在这方面,《视点》丛刊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认同的。在评介域外文化时,将清醒地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有的学术理念和课题研究会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对此,《视点》丛刊将注意它对民族文化承传的负面影响;文化交流和对话也应对域外文化资源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与取舍;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可否认,因编者学术素质的局限,在选编中难免会出现疏忽和偏差,但尽量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饱满的理性精神去对待域外人文学术研究,这应该是要努力做到的。

但有一点要强调的是,《视点》丛刊所译介的域外学术文化并非是为了照搬、效颦,也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我们的本意是为自身的学术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参照和比较。在抵御消蚀意识形态的“西化意识”的同时,积极审视、选择、吸纳有利于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建设的西方文明成果。笔者认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应包含着这种积极的出版意识。

吴士余

2001年4月

在“全球化”潮流日益席卷当代世界的今天,学术的交流和理论的“旅行”也因之变得十分便利,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莫过于使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得以实现的桥梁。因此,在本辑编成付梓之际,我们应特别感谢那些愿意让我们分享他们的智慧与观点的学者们,以及为此付出慷慨的出版机构,正是他们的开阔胸襟和远见卓识使我们体验到了交流与对话所带来的无穷乐趣,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全球化体验呢?

这些学者和出版机构分别是:詹姆斯·米特尔曼教授(Prof. James H. Mittelman),他不仅慷慨地授予了版权,而且还主动帮我与出版者及时取得了联系;弗兰克·莱希纳教授(Prof. Frank Lechner)在书信来往中就全球化之方方面面热情回答了我

的问题,并对全球化在中国的反应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迈克·费瑟斯通教授(Prof. Mike Featherstone)除提供了本书所刊的文章之外,还寄来了他的所有著作目录供我参考,而他所领导的 TCL 中心(即理论、文化与社会中心)和主编的同名杂志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文化研究者的关注;萨基娅·萨森教授(Prof. Saskia Sassen)也发来了她刚刚写就的多篇论著;罗兰·罗伯逊教授(Prof. Roland Robertson)还就他的文章的翻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此外还有让·内德文·皮特斯教授(Prof. Nederveen Jan Pieterse)、温妮·桑霍兹教授(Prof. Wayne Sandholtz)、安东尼·D·金教授(Prof. Anthony D. King)、马丁·阿尔布劳教授(Prof. Martin Albrow)、约翰·沃利教授(Prof. John Urry)以及罗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版权助理 Lisa Toyne、Lynne Rienner Publishers,版权负责人 Sally Glover 先生。

最后,自然应当感谢上海三联书店总编吴士余先生和责任编辑刘宏伟先生,是他们的创意和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最终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编 者

2002 年 1 月

(代前言)

全球化的思想

梁 展

当代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变。20 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刚刚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许还曾经把在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作是一场世界政治“地震”,而今天与这场“地震”有着某种深刻关联的“全球化”潮流却无一例外地席卷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科技的进步无疑是引发这一潮流的重要动力,日臻完善的信息技术已经造成了空前的“时空压缩”(大卫·哈维),全球正在变成一个惟一的“地方”,而在科技进步推动之下的世界经济发展亦正在把一个个真实的地方联结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旧有的“中心”与“边缘”界限也日趋模糊且处于不断的游移之中。置身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似乎真的无法感觉到历史时空的存在,无法触摸历史脉搏的律动,难怪福山会有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的感叹!我们该如何去感知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该采取何种手段来认识这个世界?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我们究竟有何作为?世界将会往何处去呢?

第一个把全球化概念引入社会学,并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此项研究的罗兰·罗伯逊首先将我们的视野引向了漫长的世界文明史。面对形形色色有关“全球化”的理论,罗伯逊从正面提出了传统社会学的转型问题,因为经典社会学的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密切相关。一般认为,现代社会学的观念起源于 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其首要的学术目标便是追求民族国家的进步与强盛。因此,经典社会学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它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治国术而服务的,因而包含着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正如罗伯逊所说,在上述理念指导下,传统社会学忽视了对全球方面的种种考虑。他指出,在认识全球化并对其作出判断之时,一个人理应保持一种道德的态度。这就是说,在审视全球化现象之时,我们应当把视野放宽到世界历史中去,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去透视它。有了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我们就会清醒地看到,全球化在人类悠久文明史当中,是一个从播种、萌发、起步、争霸向眼下这个不确定阶段不断演进的过程,而这也就是罗伯逊为全球化进程所划定的五个小阶段。罗伯特·考克斯提供给我们的是——一连串松散的思索。在他看来,全球化是西方主要发达工业国 20 世纪 70 年代危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场严重的危机促使他们建立起了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市场和金融走向联合,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流动,上述诸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加强最终促成了全球化的形成。因此,考克斯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看成了一个在不同“时间”中行进的次级领域。而这个“时间”不仅仅是从外部加以测量的时间,相反,它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建构,是事件持续不断的发生激活了我们心目中的内在时间意识,而我们反过来也在时间中重新构筑着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未来。在《相互竞争之中的多种

全球化概念》一文中,莱斯利·辛克莱区分了“国家间”(inter-nation)与“全球”两个概念,指出前者建立在民族国家分立体系之上,而后者则形成于全球走向融合的过程当中。这样,辛克莱把时下的全球化研究依据经济、文化、社会与意识形态四个不同的视角——分类,并对它们的利弊逐个展开批判性的分析。

收入本书第二辑的是一组描述当代社会全球化状况的文章。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是近年来在社会学界颇有影响的“反思现代性”(reflective modernity)即所谓“第二现代性”的创立者之一。而今,他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的概念也风靡了整个学术界。与马克思·韦伯的理性化社会观念相反,贝克注意到了为社会理性化过程所忽视了一个负面,即风险的不断产生,并把后者视为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科学决策的自信淡化了人类对风险的防范意识,而由核、化学工业造成的当代风险发生形式却是毁灭性的,它甚至容不得实验逻辑存在,因为核实验的失败也就意味着致命风险的来临。因此,贝克所谓“他人的终结、一切我们精心培育的远离他人的机遇的终结,是我们随着核与化学污染的来临所能体验到的东西”的说法绝非是危言耸听。萨基亚·萨森则将理论的触角伸向了由信息工业的空间组成所引发的传统经济生活中核心与边缘界限的进一步消退这一领域。对于地方经济来说,这一核心是跨国公司的总部;而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这个旧有的核心便是民族国家,而后者在有效管理经济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在进一步削弱。为了应对这一复杂的局面,民族国家的作用正在由管理者向立法者转变。而让·内德文·皮特斯在《作为杂合的全球化》一文中则更进一步指出,全球化应当被视为一个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断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全球化的过程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一的、同化的过程,相反,它在多种领域里

同时展开:有多少不同的学科,就会有多少种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是复数的。作者剖析道,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全球化观念掩盖了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权力关系,即把现代化/全球化的论述局限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从而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因此,他倡导对全球化做一种中性的理解,即把全球化看作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加强”。这样一来,全球化作为一个杂合的过程,其最为突出的方面莫过于社会组织形式的杂合:民族国家职能在全球经济中的减弱、全球地方化增强、民族认同的重构、组织模式的增长、生产模式的渗透等等。基于此,本文的作者呼吁建立一种新型的全球社会学。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学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成长起来的,而面对日益显著的全球化趋势,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分析框架的经典社会学必须让位于一种由后国家或国际所构成的各种时空并存的全球社会学。阿·伊·涅克列萨在他的《理解新世界的意义》中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持一种异常悲观的态度。他把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揭示为人类追求世界秩序的理想不断遭受破灭的历史:20 世纪种种历史哲学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方向的理解和描绘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这样一系列“宏大叙事”因其狭隘性和过分追求简化的模式使其与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不符。上述弊病昭示着社会科学不能仅仅局限在基础科学的领域,即局限在对人类未来前景的“沉思”之中,它应该引入“现实政治”一维,即应当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当代课题纳入自身的视野中。如此一来,当下盛行的全球化、历史的终结、社会的后现代与后工业化、信息社会、世界新秩序、文明的冲突等等术语便找到了自身的历史根源:后者是从威尔逊主义、凡尔塞体系到罗斯福新政的种种国际战略理想的集中体现。曾经以自由、民主和人道为理想的现代而今成了为“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官僚”所统治的

社会。作者禁不住要问：“西方基督教文明在 20 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何种痼疾使其在全球繁荣的巅峰感到震惊？”二战之后，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以及后来的“世界精英俱乐部”加剧了全球社会的激烈转型，它进而激发了人们对于社会哲学与战略计划的兴趣。然而，作者认为，西方近年来的社会科学往往受制于技术主义，其本质是建立在进步宗旨与范式之上的意识形态在近代社会的体现，而后者正在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人们从后现代哲学与文化学立场上来审视社会现实的道路。与以乔治·布什和克林顿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对新世界秩序所持的乐观和自信并存，西方一部分清醒人士则对其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悲观和担忧。总之，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世界格局的平衡机制被打破，本世纪将是一个多种世界体系纲领、文化模式和地区、民族利益持续发生冲突的世纪。

詹姆斯·米特尔曼在《全球化的动态结构》一文中，以东亚为例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来探讨全球性地区冲突的根本原因。作者深受卡尔·波兰尼有关自律市场会导致社会分裂与两极化的观点的启示，认为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似乎在朝着联合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自由经济结构在营造自我保护的压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规模的分裂。与亚当·斯密的经典国际劳动分工概念不同，米特尔曼认为，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即新兴工业化国家试图将自身的生产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与资本密集型。针对一些学者把上述过程归为资本自身逻辑作用的结果从而提出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解释框架，作者指出，前者忽视了生产方面的权力支配关系，因此，他以布罗代尔的理论为依据，把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配看作是一系列关系相互作用的体系，这些关系分别为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的关系、国家的压力、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关

系以及对全球化的抵抗几个方面。在对上述一系列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中,米特尔曼透视了国家职能的削弱、其面对全球化压力的改革、民主模式的多重变化以及弱势群体对全球化的反抗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等社会现象。在东亚,伴随着国家对于某些受宠工业的资助和对某些地区的优惠政策的实施,行业和地区的冲突也在升级,少数族裔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遭到了排斥,于是便出现了新的社会运动。在国际上,全球化同时加剧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局面,造成了新的富裕和贫困的国际阶层。因此,作者得出了结论:全球化既是社会冲突的媒介,又是社会冲突的结果。然而,全球化的进程又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最终促进了法律和规则的演化,这也正是维纳·桑多兹在《全球化与规则的演进》一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本文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作者所提出的规则结构、规则变化、行为与话语之间的互动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就贯穿着这么一个动态的关系:全球化使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规则普及化了,而日趋完备的规则体系转变成了法律,随之产生了监督实施这些法律的各种各样的国际机构。这样,行为者、规则、法律、机构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不断推动着全球社会不断走向进步。

然而,在上述背景当中,全球文化的融合并非是个个民族文化走向同质化、西方化或者说是美国化。迈克·费瑟斯通认为,对全球文化的理解必须以一种世界状态结构为前提,而后者应当按照一个变化的过程来思考。这就是说,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分裂不仅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有可能在超越国家—社会这个经典社会学单位划分的层面上发展,即它有可能成为“第三种文化”。后现代主义便是依据流行与地方话语的差异、多样性、丰富性、规则、反抗与秩序而展开的实践活动,它要求摆脱一切象征性统治集团的控制,跨越民族国家的限制,强调在单个地方上包含各种差异的全球概念。因此,

社会学不应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之内,而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国际化和全球化问题之上。实质上,自启蒙运动以来,全球化和普世化一直就是社会学关注的对象。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工业化、理性化而来的本身就是一种普世化的社会理想。而世界体系与国际关系理论在强调单个民族国家在加入国际体系之前的特殊性时,忽视了先于其而以文化形式出现的国际国家体系的存在。其实,民族国家可能通过帝国霸权、世界联邦主义等等途径营造一种全球环境,从而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它拥有自身的进程和统一性。这样一来,全球化就可以被定义为“文化间的不断影响和交往的宗教”,而全球文化随之呈现出诸如族裔、技术、金融、媒体与意识形态的多重景观。与这种全球化概念一同而来的是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的重视,这集中体现在安东尼·D·金对现代性不同时空的论述当中。如他所说,“‘现代’这个词汇,部分地由于其在英语(及后来的美国英语)中的语言学词源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与国际英语的语言霸权,用一个空间和地理的,尽管也是经济、政治、道德与哲学的比喻来说,已经毫无疑问地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考察“现代性”历史时空展开的过程中,他试图努力在去除现代性的空间——西方——限制,寻求一个包括东方现代性在内的现代性定义。埃克托尔·吉扬·罗莫从空间方面分析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分工与分配问题。作者在列举了种种经济全球化趋势之后指出,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的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把各国联系在一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投资的增长相比,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既新颖又不可一世,然而它却对北方国家、南方国家的就业和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南方国家低工资高技能的优势,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东亚国家,这导致了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失业率猛增,由此引起了新的贫富差距问题;而南方国家

出于外债的压力,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上述国家的经济被转向外向型,这进一步加剧了南方国家与东欧国家的竞争,同时一部分产业被排除在出口加工工业之外,而后者亦对生产国的经济贡献甚微。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南方国家的经济也遭受了严重的危机,从而使其愈加走向贫困。在罗莫看来造成这一切后果的罪魁祸首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自发现象,不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追求具体目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硕果”。

与抽象的经济、文化全球理论论述不同,马丁·奥尔布罗把目光转向来自城市日常生活中那种细致入微的全球化体验之上。作者选取了位于伦敦市内的一个名为图廷的社区,在这个地区,亚裔与白人和睦相处。然而,他们彼此拥有不同的图廷社区形象。从他们各自的言谈之中,我们了解到,图廷这个地方的区域特征是目前许多千差万别的生活方式和结构社会的并存。与传统社会学提供给我们观念不同,奥尔布罗认为不应把上述事实看成是对同一现象的零碎看法,而应当以一种新的地方概念来理解它。这样看来,它并不是一种混乱,而是另一种秩序:地方本身就是全球化情感、行为得以维系的地点。约翰·厄里则集中探讨了全球媒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世界主义观念的过程。作者以电视、新闻、广告等等为例,提示了现代媒体对“全球化的他者”的建构方式,从中透视出世界主义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在指出那些充斥电视屏幕的广告出于营销策略而对“全球主义”所进行的种种滥用之后,厄里认为后者是在把“全球化”作为一个共存世界的布景来使用的,而真正的“世界主义”应当是“一种文化倾向,包含着由理智的思索与审美立场相结合而产生的态度,对其他民族其他地域以及不同的文化体验,尤其是对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体验的开放态度”。

视点

主编 / 吴士余

1 / 梁展 全球化的思想(代前言)

·理论经纬·

1 / [美] 罗兰·罗伯逊 为全球化定位:全球化作为中心概念

16 / [加] 罗伯特·考克斯 从不同的角度透视全球化

29 / [美] 莱斯利·辛克莱 相互竞争之中的多种全球化概念

·全球视野·

50 / [德] 乌尔利希·贝克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生存问题、社会结构与生态启蒙

79 / [美] 萨基亚·萨森 信息产业的空间组织方式对国家职能的启示

Perspective

目 录 1